

《大同報》建構之在華官員關係網 及其影響初探*

宋豔華

[提 要] 《大同報》是廣學會在華創辦的一份社會科學綜合性刊物,其發行範圍幾近遍佈全國,這與中國官員的襄助密不可分。晚清,中國官員接受《大同報》以報入像、來函登載的營銷策略,通過塑造良好的報刊形象來抬升社會地位。《大同報》則憑藉官員代銷制的實施,將發行系統深入到地方府縣一級,並在中國官員群體中形成制度化閱讀。兩者在共贏利益的驅動下,建構了彼此成就的互動關係網,直至辛亥革命爆發致使關係中斷。民初,《大同報》調整發行策略,通過加強與讀者、其它報社間的互動來重構閱讀共同體,並藉由慶典再度與中國官員建立聯繫。然而,媒介的持續運營依賴於政治權力機制的穩定。最終,在官員更迭頻繁的社會變革時期,《大同報》的運營戛然而止。《大同報》建構在華官員網的過程,折射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革之下大眾媒介與政治權力博弈與合作的場景。

[關鍵詞] 《大同報》 廣學會 官員代銷 互動網絡

[中圖分類號] G219.29; K2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2 - 0095 - 11

報刊作為獨特的知識空間,在近代中國文化傳播過程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開啟民智的重要工具,亦是報人引導社會輿論的重要載體。廣學會總幹事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認為,只要掌控中國報刊出版的話語權,“我們就控制了這個國家的頭和背脊骨”。^①《大同報》是 20 世紀初被廣學會用來代替《萬國公報》,繼續在中國菁英階層宣傳社會改良思想的綜合性報刊。有學者認為,“與之前傳教士報刊閱讀情況不一樣的是,《時務報》開創了‘制度化’閱讀的前例,它得到了諸多地方督撫的強力支持。”^②就此而言,《大同報》實有過之,它雖由傳教士倡辦,卻通過官員代銷制建構起共贏的互動關係網,使得該報在清末民初的官員群體中廣為傳閱。

媒介社會學學者邁克爾·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曾言,“新聞業的變遷,與廣闊的社會、經

* 本文係 2020 年南京大學優秀博士研究生創新能力提升計劃 B 計劃項目“傳教士與中國社會變革——季理斐在華活動研究”(項目號:202002B069)以及 2018 年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創新創意研究計劃項目“廣學會與近代上海報刊發行事業研究”(項目號:CXCY18-10)的階段性成果。

濟和政治的轉變有着密切的關係”。^③近代中國報刊媒介的崛起與發展深受社會變革的影響,《大同報》即為縮影。它不僅行隨事遷地調整發行策略,亦積極參與到構建社會的歷程之中。廣學會如何在《大同報》發行過程中構建社會關係網,贏得官員群體的認同?《大同報》的發行策略與閱報者、時代脈絡之間有何關聯?閱報者披覽《大同報》文本內容之後,有何閱讀感受?釐清上述問題,是認知廣學會在近代中國社會構建“閱讀共同體”的重要環節。目前學界對《大同報》尚無專門研究,僅在概述傳教士中文辦報活動時偶有提及,且存在訛說。^④本文擬在梳理《大同報》歷史沿革的基礎上,以《大同報》發行過程中構建官員互動關係網為切入點,考察清末民初傳教士如何以報為介與官員進行互動,從而形成“制度化閱讀”。

一、“百國寶書”——《大同報》之歷史沿革

《大同報》是廣學會在華發行報刊的成功典範,被袁世凱讚譽為“百國寶書”^⑤,段祺瑞更將其媲美英國《泰晤士報》。此報創辦,與近代上海報刊發行事業的繁榮緊密相關。1900年前後,上海湧現出《女學報》、《上海青年》、《商務報》、《五洲彙報》、《中國白話報》等大批新報,中國女子教育先驅呂碧城對此評論:“毋論其內容如何,即表面觀之,亦勃然燦然,一文明之現象矣。”^⑥新式報刊的創辦給廣學會帶來巨大壓力,畢竟它一直倡導西方文學應在中國謀得一席之地。當時,廣學會主推的《萬國公報》、《中西教會報》均為月刊,周期長,無法及時傳遞最新訊息,難與滬上其它報紙競爭。廣學會要在出版業並驅爭先,勢必要創辦新的報刊。

1904年2月,廣學會正式發行周刊《大同報》(*The Chinese Weekly*),由英國傳教士高葆真(William Arthur Cornaby)擔任主編。此報以“交換智識,輸入文明”為宗旨,提倡“大同”旨在敦促各國“化其偏見,泯其仇視,地無分歐亞,人無分黃白,而一歸之於大同之中”^⑦。此報定位與《萬國公報》一致,聚焦於中國的菁英階層:“幫助中國的統治者、文人和思想家,使他們善用世界上最好的思想來思考、行動。”^⑧在內容編排上,《大同報》設有論著、社說、中外大事記、智叢、譯文雜纂等版塊,尤為注重時事報道。加拿大傳教士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對此評論道:“公報重論說,大同報重紀事,如左右驂焉。”^⑨

1907年,《大同報》實施改良。時任主編莫安仁(Evan Morgan)重申辦報宗旨:“一曰輔新政;一曰匡教育;一曰培人格。”^⑩可見,此報影響中國政治人物的意圖清晰,故其受眾很具針對性,“發行量每周3,500份,其中2,000多份向各級高級官員發放。”^⑪經改良,《大同報》每冊篇幅約38頁,欄目調整為圖畫、論著、譯述、論旨、新聞等版塊。其中,譯述版塊又涵蓋憲政、財政、學政、農政、路礦、衛生、天文等內容,欲將西方最新知識傳入中國。山西巡撫恩壽將《大同報》的改良廣告進行展閱宣傳,並就改版內容評價道:“自法政、教育及農商、工藝,靡不分門別類,推陳出新,為報界中放一大光彩,字林朝日,不得專美於前矣。”^⑫學部尚書榮慶稱:“大報採擷宏富,又經改良,必當為社會所歡迎固無俟。”^⑬《字林西報》亦對此報給予肯定:“訂購半年份《大同報》,將是送給中國文人的最好禮物。”^⑭此後,《大同報》一度傳頌於中國各級官吏,暢銷海內外。

民國成立後,一大批支持廣學會的清朝官員在政權更迭中被替代,加之中國本土出版機構肩負起引介西學的重任,《大同報》的社會影響力有所下降。不過,廣學會人士之反應相當平靜:“這並不奇怪,它以前受官員照拂,他們的不安影響了我們的發行。我們仍將前行,並有理由相信,儘管事態發生了錯位,但該報因向內地民眾傳播新聞行之有效,已被通曉。”^⑮媒介對社會的報道並非鏡式反映,而是主動參與構建,廣學會深諳此道。為提升銷量,1913年,時任主編季理斐立足於中國的

現實需求,着手《大同報》內容改良,除遵循常例撰寫文章外,就道德、民主、教育、農學、衛生、科普等主題進行組稿。同時,在維繫原價的基礎上,每周增加 20 頁篇幅以增強報刊的競爭力。

1915 年 1 月,《大同報》再次進行改良,由周刊改為月刊,並更名為《大同月報》。在欄目設置上,月報分為圖畫、論著、記錄、譯述、雜纂五大版塊,較從前增加了哲學、傳記的比重。不過,月報銷售不佳,入不敷出。據 1916 年廣學會年度報告記載:該報年收入 910.14 美元,年支出 1,052.05 美元,共計虧損 141.91 美元。^⑥季理斐認為,月報虧損的重要原因在於“不能在文章中添加地址,無法與詢問者通信”,^⑦導致讀者無法向月報提供定向資助。為此,季理斐主張大同報社既要提高文章質量,同時要重視開闢各種社會聯絡渠道。然而,這些舉措收效甚微,《大同報》於 1917 年停刊,共發行 575 期。它的停刊,宣告廣學會基本退出了宣傳政治改革的前沿,正如陳喆所言:“在中國歷史上——個傳教士出入王侯將相之宅,活躍於政界,呼風喚雨,為華人師的時代結束了。”^⑧

《大同報》停刊是多方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除卻虧損嚴重,廣學會還總結出如下原因:(1)時局不穩,銷售渠道阻塞。1917 年的張勳復辟及護法運動,使廣學會報業頗受影響:“本會新聞局非但沒有興旺,甚至一度暫停,特別基金也已用盡。它在政治或一般主題上穿插基督教話題,大都遭到拒絕,很難被世俗報刊轉載”;(2)戰爭當前,紙張供應不足;(3)外匯交易反復無常,廣學會接收的西國資助大幅貶值,無力承擔印刷成本。^⑨實際上,《大同報》停刊的真正緣由是中國社會發生變革。袁世凱的離世及國家政權的更迭使《大同報》失去了舊交官員們的鼎力支持,市場份額大幅縮減。與此同時,1914 年爆發的歐戰表明西方政體並非完美無瑕,宣揚西方執政理念的《大同報》自然乏人問津。《大同報》停刊之後,曾有人籌劃復刊之事。鑑於“紙張成本過高、工資增加影響到報刊的印刷,且普通人生活成本大幅上漲,成品銷售受阻”,^⑩廣學會被迫擱置重辦《大同報》事宜。

《大同報》共計發行 14 年,運營周期不長,卻在清末民初中國社會有着不可忽視的影響,亦在傳教士中文報刊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這不僅出於該報內容豐富,取材立足於中國現實的原因,更與它獨具一格的銷售模式密切相關。

二、晚清官員形象塑造、代銷報刊與“制度化閱讀”

《大同報》的目標受眾是中國官員群體,它的發行亦與官員的互動往來密切相關。創刊之初,主編高葆真在《北華捷報》表示:“現在每天及以後,免費報紙將被送到整個帝國所有主要官員的手中。”^⑪此免費報紙,即為《大同報》。廣學會多次在《申報》、《時報》、《新聞報》等報媒為《大同報》做廣告宣傳,以增加知名度。1905 年,《大同報》每周被全中國超過 60 位政要閱覽,被廣學會稱之為“有益的力量”^⑫。通過前期的宣傳與傳閱,《大同報》以贈閱的方式在中國官員中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有此基礎,《大同報》開始以官員為互動群體,大刀闊斧地實行報紙革新。

晚清以降,許多社會權貴以報為介向大眾呈現肖像照,以此獲取媒體身份,進入到公共關注空間。1907 年,《大同報》實行改良,設置圖畫專欄,專門刊登中外達官貴人的肖像與題詞。“大清國慈禧皇太后陛下”、“大清國光緒皇帝陛下”的肖像載於首期圖畫專欄,充分抓住民眾的獵奇心理,促進了報刊銷量。官員們樂於選擇在《大同報》刊載,多緣於此報印刷品質較於它刊更為精良。山東布政使吳廷斌指出:“添列圖畫一門,吾華各報中雖常有此,然模糊不明,難令閱者心賞。台端欲為報界放大光明,必別有一番考校。加惠中邦,良深欽佩。”^⑬為保障照片來源穩定,編者季理斐曾向讀者發出請求:“現正作出特別努力,以確保定期供應中國公眾人物、公共建築、集會等插圖,我將感謝您提供適當的照片。”^⑭

官員以肖像刊載於《大同報》為榮，借此塑造報刊形象，抬升社會地位與聲望。所謂官員報刊形象，是指官員以報刊為媒介向公眾展現人物風采，期許獲得良好的媒體身份。作為社會中建構現實極具象徵的力量，大眾媒體享有公眾的高度信任。因此，在社會變革時期，官員格外看重報刊的信息傳遞效應，常藉由報刊與閱報者互動，以贏得民眾的擁護。1907年，山東布政使吳廷斌感言：“今附入報中，傳之海內外，從此身價倍增，曷勝榮幸，官非司馬，容貌竟重於海疆，才遜潞公，聲名亦播於絕域。”^②而《大同報》以闡新學、開民智為旨歸，也使得清廷官員頗為看好此報的發行前景。浙江巡撫張曾敫於1907年登載肖像時，預言此報“定不脛而走，紙張貴洛陽。”^③

《大同報》不單刊登官員照片，還採取圖文結合的方式，附載官員來往信函。在圖像與文字的互釋中，展現人物的性格張力，增添形象的立體感。所附信函往往是官員自述口吻，便於拉近官員與讀者間的距離。湖北提督夏毓秀在所附肖像後略述：“秀不過為華中武夫，又何足為海外旌揚，服官雖四十餘年，轉戰數省，先後受槍炮刀矛面傷數十處，愧無韓范之功，豈有孫吳之略，時艱無補，徒深愧歎。今乃台端不棄，列入報前，殊覺榮幸。”^④寥寥數語，在讀者面前呈現了夏毓秀保衛祖國英勇驍戰的形象，令民眾閱之動容。再如浙江巡撫張曾敫：“本部院忝撫浙疆，朐經三載，蹉跎霜鬢，顧影自憎，奈荷盛情，索取小照，慚無人倫儀表之資，難言圖書衣冠之選，惟既辱來書諄切，謹寄上影片一紙，聊代晤面，用志深交。”^⑤張曾敫將自身相貌的衰老表徵，歸結於為黎民百姓的操持，以此博取公眾的敬佩之心。美國社會學家庫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曾言：“通過精神交流這個中介物，通過語言這個載體，包括在最廣泛的詞語的意義上的書寫、印刷以及傳播思想的每一種方式，這個過程的社會方面就發生了。”^⑥官員在報刊自述，是以語言為載體，與讀者進行精神交流，這令民眾心目中的官員形象更加真實與生動，無形之中建構了兩者間的社會交往。

官員以報入像，運用名人效應吸引了閱報者的關注，官員的社會聲望提升，亦促使他們主動對《大同報》進行傳播，生成新的廣告效力。兩廣總督周馥稱：“《大同報》改良伊始於心學、新理，更多發明，自能風行海內。”^⑦山西提學使錫嘏：“《大同報》組織完善，採錄精良，堪為牖啟華民之助，具見熱誠、公益，欽佩莫名。”^⑧山西按察使丁寶銓稱此報是“宏才碩書”^⑨。江蘇巡撫陳夔龍談閱報感受：“前閱貴報綱羅，宏富海內風馳，茲復極意改良，通五洲政藝之郵，發萬物機緘之秘。誠足補助教育，啟發文明，引領宏規。”^⑩眾多地方大員的認可，引發廣學會愈加重視《大同報》的推介發行。

為打通官員的閱報空間，廣學會還實行官員代銷制，即委託中國各級官員訂購或代派報刊。《大同報》編輯在致函中國官員索要肖像、題詞時，還向他們表達了代銷報刊的請求，這在近代傳教士中文報刊史上可謂創舉。地方官員為提升個人在省內的聲望，也樂於竭誠效勞。1907年11月，工部尚書呂海寰點明各級官員接受代銷的緣由，一是受廣學會的委託請求，二是報刊質量頗佳，有益於中國開通風氣：“承示《大同報》改良伊始，屬為函商各省按期代銷，既蒙誦諉之殷，敢辭提倡之誼？況貴報取材豐富，洞合時宜，自應宇內風行，不脛而檢，交數十份以便廣為函布。”^⑪官員代銷報刊，從制度上保障了《大同報》在地方上的發行。同時，此報發行範圍越廣，“以報入像”的地方官員在全國範圍內的知名度則越高。代銷報刊可謂廣學會與中國官員的互惠之舉，兩者很快達成共識。

1907年，廣學會致函山東布政使吳廷斌，希望山東官員代銷《大同報》。吳廷斌回應稱，地方政府已有代派官報的任務，再推銷傳教士報刊有一定的難度：“商各府州縣據回稱，均以近年派報太多，報費難籌，請從未減。”不過，吳廷斌表示，代銷一事自當遵辦，“弟擬照此間派官報之例稍多，大縣每處派三十份，中縣二十份，小縣十份，十府三直隸州各二份。用副雅懷，以後再為設法推廣”。^⑫兩周後，山東巡撫楊士驤在致廣學會的信函中提及：“貴報宗旨純正，議論明通，凡在東人均以先睹

為快，已與吳方伯商准。請每期寄下九百份以廣流傳”。³⁹可見，地方官員對《大同報》進入府縣一級發行網絡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山東之外，其它省份官員也積極代銷《大同報》。兩廣總督周馥在給廣學會的回函中稱，“請尊處先寄一百份來，即自明年中曆正月為始，以後察看能否暢銷，再行增加”。⁴⁰山西巡撫恩壽對推廣《大同報》表態，曰：“代銷自當力效綿薄，但敝省風氣萌芽伊始，為數過巨，轉恐遲滯，請先寄五百份。俾分各處購閱，如可推廣，即函請添寄新聞雜誌。”⁴¹江西巡撫瑞良向李提摩太允諾：“貴報廣籌銷路，該處亦樂為代銷，一面於接見僚屬時，示以貴報之精，審令向派報處按其訂購，以期漸推漸廣，改良廣告已交派報處張貼門首，其派銷章程如何及應否先寄若干冊藉，備購報者詢問之處，統祈酌定，以期便捷”。⁴²按他指令，南昌總派報處在派銷官報之際，亦設法推廣《大同報》。此後，瑞良又將此報歸商派銷，交由南昌商學社派報處負責，以廣銷路。

即便是當時較為偏僻的西北與東北地區，當地官員也積極代銷《大同報》。陝西巡撫曹鴻勳表態：“已飭各屬自向貴會從多訂購，以廣傳閱。”⁴³吉林將軍達桂稱治地屬邊疆，州縣缺少，屬吏無多，先代銷五十冊以作宣傳，並表示：“貴報既採擷宏福，論著淵博，吉省鄉紳當必聞風興起，爭先快睹，不患不日益發達，隨時添購也。”⁴⁴此外，駐藏大臣張蔭棠要求廣學會向其定期郵寄《大同報》，計劃照此例在拉薩開辦新報。⁴⁵在各省督撫的推廣之下，許多地方官員短時間內瞭解並訂閱《大同報》，為廣學會培養府縣一級的地方性閱讀群體起到了促進作用。當然，廣學會自知《大同報》在報刊林立的上海並沒有競爭優勢，依託官員代銷制度才成功地打入內地市場：“由於上海本地日報供應充足，這種級別的週刊在滬銷量有限，但它在內地的發行人數似乎大於任何上海日報。”⁴⁶應當指出的是，官員代銷也有難以推諉的成分。前福建布政使連甲稱：“惟酌度閩省現今情形，若三四百份或尚可代為分派，倘若遵示數目，則恐未能應命之。”⁴⁷

隨着官員代銷報刊的實行，《大同報》在全國範圍內廣為流布，其作為新聞紙與知識紙的價值亦得到眾多官員的認可。廣東水師提督李準讚歎：“大報持論名通，達古今之宜，調中西之說，誠足以開通民智，鼓吹文明，良深欽佩。”⁴⁸上海縣令李超瓊承諾隨時向學界、商界廣推此報：“今承賜示《大同報》一冊，發揮政學，蒐輯中西宗旨，既極平正，而又改良伊始，變新聞之舊例，為雜誌之成編，體裁尤見精美。諸君子撰譯盛心，實堪欽佩，宜其按期出版，海內風行。”⁴⁹官方推介對提高《大同報》的銷量功不可沒，這直接體現在發行人數上。1906年，《大同報》發行78,000冊，986,000頁。⁵⁰到1907年，銷量翻倍，計發行153,800冊，5,804,800頁。⁵¹1908年，《大同報》主編高葆真在給《字林西報》編輯的信中提到，“《大同報》在中國官員之間變得非常流行，2,500名官員讚許它”。⁵²某種程度上講，《大同報》在晚清官員之間形成了“制度化閱讀”。

官員的訂報行為對地方民眾具有一定的引領效用。1905年，來自宜昌的八名士紳訂購了一年《大同報》。丹陽商會總董董影禪是此報的忠實讀者：“貴報自出版以來，早與友人合購一份。”⁵³1908年，戴士鐸、覺民甫特別撰文發表閱報感言：“其內容若憲政、財政、學政、路礦、衛生諸門，皆歐美行之而卓著成效者，今為之一一介紹。吾國如作書然，吾國人士得其稿而張皇之，何難一躍而相與競盛？”⁵⁴此外，許多僻居偏遠城鎮的傳教士也在傳閱此報。廣學會曾收到某傳教士來信：“得益於該報，我與當地的名門望族建立了友好關係。我們翹首期盼《大同報》，當它包羅萬象的內容一到，便如饑似渴地閱讀起來。”⁵⁵鄉下訂購《大同報》並非易事，需審慎考慮報價及郵費，因此一份《大同報》常反復傳閱於鄉間讀者，直至磨損耗盡。對此借閱現象，曾有傳教士評價：“此報的影響程度遠超過其發行人數。”⁵⁶

《大同報》是近代傳教士在華創辦的第一份以官員肖像入報，並附載往來信函的綜合性周刊。美國學者蓋姆森(William A. Gamson)指出，“任何話語主體若想參與故事建構，都首先要在媒體中獲得‘出場’的機會”，⁵³《大同報》即為近代中國官員提供了展示風采的媒介平台。通過“以像入報”，此報聯絡的政要幾乎遍及晚清中國大多數省份。官員經由此報塑造良好的報刊形象，提升了社會聲望。媒介作為權力話語的重要生產者，勢必影響到社會實踐的建構。官員代銷制的實施，亦將《大同報》的發行範圍推廣至各省、各府縣一級，在官員群體中形成“制度化閱讀”，客觀上亦推動了近代中國官員對新式報刊的傳播。《大同報》注重與官員關係網絡的建構，既是報業競爭激烈環境下的策略選擇，也是為了貼近中國的上層菁英進而參與到中國的社會變革。

三、互動與促進：廣學會重構“閱讀共同體”

在創建“知識倉庫”初期，傳教士扮演了主力角色。傳教士開展文字事工，旨在宣傳上帝福音，但也為中國士人提供了追求“世界知識”的窗口。⁵⁴廣學會是傳教士創辦的出版機構，一直致力於以報刊為媒介在中國官員、文人之間構建“閱讀共同體”，使其對“世界知識”“基督理念”產生一定的閱讀認知。

贈閱是廣學會建構閱讀共同體的重要舉措。這不僅體現在廣學會向各級官員免費贈送新刊，也體現在過刊的處理方法。季理斐經營報刊的心得是“不要積壓市場，要提高效率與質量”，⁵⁵印刷出庫的報刊無論是售賣、代派、贈刊，亦或過刊郵寄，必須要物盡其用。1906年，《教務雜誌》刊登一封季理斐寫給基督徒卡德威爾(J. E. Cardwell)的信件，提到廣學會處理舊刊的方法，讀者只需支付郵費便可免費獲得：“廣學會準備免費提供《萬國公報》和《大同報》的舊刊。這些報刊沉博絕麗，將引導讀者更加全面地理解真理和進步的價值。收貨人承擔所有郵資、運費和包裝費用。訂購時請發郵資3美元以支付費用，任何餘額都會退還給您。”⁵⁶贈閱不僅可以處理積存的舊刊，也可為讀者節省訂閱費用。

廣學會主要通過郵寄的方式，將報刊送至各地讀者手中。《大同報》全年訂購3美元，每份8分，含郵費在內。廣學會之所以能廉價郵寄報刊，與海關總稅務司兼廣學會首任董事長赫德(Robert Hart)有關：“他服務建設的帝國郵政，可與歐洲所有國家/地區的郵政系統相提並論，因為從中受益的人數約等於整個歐洲的人數。”⁵⁷在赫德的主持下，上海郵政系統迅速拓展。“1901年，176家郵局；1907年，2,803家；1908年，3,493家”⁵⁸。到1911年，廣學會宣稱：“中國所有省份超過1,000名主要士紳的地址已被知悉，得益於郵政體系的廣泛，現有可能經由寄報接觸到這些聲名遠揚的人物。”⁵⁹廣學會曾將包含《大同報》在內的出版物分別寄給8位總督和18位巡撫。一位巡撫答覆稱，他已將廣學會的書報推薦給本省提督學政，命其擇選適宜大學堂的讀物。另一位巡撫回應，擬於省博物院放置廣學會書籍，方便往來遊客閱讀。⁶⁰

1911年，廣學會再次重申《大同報》以中國官員為服務對象，“在一切民族運動中幫助和指導中國人，使他們走向更豐富和更自由的生活。”⁶¹辛亥革命之後，曾與廣學會交好的清朝官更多在政權更迭中被民國政要取代。失去官員庇護的《大同報》發展勢力迅速萎縮。這在發行量上可窺見一斑：1911年，《大同報》發行119,630冊⁶²，而到1912年則銳減一半，發行50,000冊。這很大程度緣於晚清實行的官員代銷制在新政權下難以為繼：“四川總督和山東巡撫今年沒有續購大噸位的訂單，這大大減少了流通。”⁶³

1913年6月，季理斐接任《大同報》主編。此時，該報運營狀況並不樂觀。季理斐致函加拿大

海外傳教委員會主席麥凱(Robert Peter Mackay)時提及：“受革命影響，我們的訂單大幅減少，我希望重燃社會對這份報刊的興趣。儘管報界競爭激烈，但《大同報》理應繼續得到傳教機構的支持，因為它佔有自己的定位群體。今天的趨勢是，報刊幾乎完全在傳播中國人的最新思想，西方思想則日益被排擠。我們知道，中國人終將涵蓋整個報刊領域，但假若傳教士不再引介西學，將對中國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而這份報刊則是直接的傳教平台。”⁶⁶在季理斐看來，《大同報》應繼續擔負起向中國官員引介西學的責任，否則傳教士將喪失知識中介的地位。

為維繫《大同報》的社會影響力，廣學會探索新的路徑來建構閱讀共同體。其中，轉載贈刊的方式極大促進了廣學會與中國其它報社間的互通。所謂“轉載贈刊”，指其它報社轉載《大同報》的登文，即可獲贈報刊。報社轉載文章對大同報社而言，可謂屢見不鮮。早在創刊的1904年，時任主編高葆真刊於此報的文章已被多個報社主動轉載：“有些被本地報紙轉載，有些被香港報紙轉載，還有些被日本報紙轉載。”⁶⁷晚清時期，頗負盛名的《四川官話》大量轉載《大同報》文章，尤以外國新聞，如寬待屬國、皇后外交、屬地海防等，以期開通風氣，啟迪民智。此外，《萬國公報》、《秦中官報》、《四川教育官報》、《預備立憲公會報》亦時常從《大同報》轉載最新教育、農學、理財的文章。

民國建立之後，《大同報》官派份額減少，廣學會更加重視其它報社的轉載數量。1913年，廣學會特立“新聞局”，由季理斐主持，負責聯絡中國各地報社，鼓勵其轉載報刊登文。此後，季理斐主動寄文至各地報社：“自擔任編輯以來，我一直在重印《大同報》的主要文章，將它們發送給中國各地約20家報社。收到了最令人滿意的答覆，許多報刊都全文轉載。通過這種方式，我們的讀者人數大大增加。”⁶⁸據廣學會統計，《大同報》在1913年4月至5月共發表22篇文章：“我們共追蹤到68篇重印本，這還不包括香港出版的基督教日報或各種引用過文章的宣教材料。”⁶⁹可見，轉載贈刊策略效果良好，甚至一些傳播福音的文章也被頻繁重印，《大同報》成為閱報者均享的共同知識文本。

1914年，廣學會新聞局每月固定兩次向全國各大報社郵寄《大同報》的文章，“希望它們能被轉載，以便對中國人至關重要的話題形成輿論”。⁷⁰由此，大量以基督教觀點寫成的世俗文章在全國散播開來，《大同報》被廣泛推廣：“今年以來，新聞局編寫的數十篇文章被定期發送給多達100家中文報紙，許多報社為迎合讀者利益而樂於轉載。在1912年之前，編輯原以引用這些材料為恥，但現在，他們的立場完全改變，樂與我們開展合作。”⁷¹其中，《旱地種麥法》被《農林公報》轉載，⁷²即便在《大同報》停刊後，《農業淺說》仍在轉載此文。⁷³《大同報》的轉載贈刊策略非常成功，重新贏得上層社會的關注，季理斐坦言：“我們接觸到許多迄今未通過普通手段接觸到的官員。”⁷⁴此時，報紙的轉載量已不單關乎報社收入，也是其展現媒介社會價值的重要憑證。

鑑於《大同報》的社會影響力提升，廣學會試圖再次與民國官員建立互動關係網。廣學會從未放棄在中國走上層階層的路線，因為“改變了達官貴人，其餘的就會像綿羊一樣跟着走”。⁷⁵1914年，適逢《大同報》創刊十周年紀念。廣學會利用慶典契機，聯絡社會權貴，將此報的社會聲望推到鼎盛。主編季理斐向政府要員特約賀詞，官員欣然應允。時任大總統袁世凱稱《大同報》“功在無形，絕代輶軒，屬辭比事，百國寶書，窮微抉秘，視人猶己，務開民智，四海昆弟比物”⁷⁶；副總統黎元洪在賀詞中對《大同報》所做貢獻給予肯定，“宏編鉅制，炳炳煌煌，世界政聞，儒先哲理，捆載而來，惠我學子。”⁷⁷陸軍總長段祺瑞認為該報可與英國《泰晤士報》相媲美，“其價值超出各種新聞之上。”⁷⁸國務總理熊希齡則以華麗辭藻撰寫賀詞如下：

物競叢叢，大同是趨，疇拖厥緒，疇握厥樞，猗茲鴻構，燁曜寰區，緝辭星炳，異義葩敷，

將導群萌共開，元模文化，既振萬象，昭甦上列典要，皋宰黃虞旁蒐藝林荊璧珠，歐美盛軌，咸有徑途，更擷菁英，是灌是輸，惟斯宏願，永永不渝，高山景行，告我士夫。^③

外交總長孫寶琦先是稱讚《大同報》十年間在傳播西學上的成就：“迪我黔黎，崇論之功，有功弗居，聞乃益隆，寰宇同風，此其嚆矢，祝大同報，千載萬禩”，又表達對主編季理斐的敬意：“博士初基，公實大之，有如霹靂抉陰，蕩霾擢自，幽谷躋於春台，又如大河汨汨東注，洶湧澎湃，滌蕩積汗。”^④此外，司法總長梁啟超也應邀致賀詞，這無不昭顯《大同報》影響之大。實際上，媒介慶典是一種文化傳播儀式，參與社會實踐的建構。美國學者凱瑞（James W. Carey）指出，“在儀式觀中，傳播的本質在於以一種團體或共同的身份把人們吸引到一起的神聖典禮。”^⑤促使中國政要齊聚《大同報》十周年慶典，正是基於他們“閱報者”的共同身份，這與《大同報》一直以來推行的官員代銷制、官員報刊形象營銷息息相關。某種程度上講，閱讀世界反映了權力的展演與抗爭，互動網絡建構的前提是群體間存在共贏的利益。

正是通過以上各種發行策略，《大同報》作為傳教士創辦的中文報刊，方能得到清末民初中國官員的多方支持，在中國超過一半省份廣為流布。藉由此報，廣學會在華建構起菁英互動關係網，促進了中國官員與傳教士之間的交流。季理斐興奮地感嘆，“領導一億人的官員在我們面前謙遜得如學生一般”。可見，近代中國報刊不單是傳遞信息的載體，亦參與到文化生成的社會互動過程。不僅如此，《大同報》的發行範圍遠超中國大陸，“來自澳大利亞、婆羅洲、巴西、英屬圭亞那、緬甸、加拿大、台灣、日本、爪哇、韓國、馬來亞、新西蘭、檳城、夏威夷群島、新加坡、德蘭士瓦和美國幾個城市均發來訂單”^⑥。

毋庸諱言，《大同報》為拉攏權貴，存在過度恭維中國政府官員的現象，遭到社會人士的指責。季理斐曾撰文《論袁黎正副二總統之新喻言》，指出“中國由專制而共和，論首功當推袁黎正副二總統”^⑦。廣學會編輯杭海批判道：“廣學會繼任總理季理斐博士，竟有一度在本會出版之《大同月刊》中，附和袁賊論政之語，可為廣學會出報之惟奇恥大辱焉。”^⑧且《大同報》在傳播西學知識時，字裡行間夾帶基督教義的宣傳，這導致廣學會建構的知識倉庫宗教色彩過於濃重。

餘 論

媒介與社會之間並非簡單的鏡像呈現，而是存在着動態的互建關聯。近代以報刊為主的大眾媒介在文本敘事中對個體進行身份定位，由此嵌入社會權力機制，成為各種社會關係的中介，這在《大同報》的發行過程中可窺見一二。清末民初，廣學會創辦《大同報》以維繫“華人之師”的地位，並借此平台與中國官員構建了彼此成就的互動關係網。廣學會是互動網絡的倡導者，這也呼應了李提摩太素來推行的“上層人路線”。晚清以降，廣學會委託中國各級官員在轄內代銷《大同報》。在官員的推介下，《大同報》方能在府縣一級得以推廣，形成幾乎輻射全國的銷售網絡。鑑於“傳播訊息的生產交換過程不可避免地要依賴於組織和制度性結構”，^⑨媒介從業者積極在意義維度上尋求與媒介使用者的互惠認同。中國官員群體既是廣學會發行報刊的目標受眾，也是互動網絡的建構者。中國官員一面從《大同報》汲取最新西學知識，一面接受廣學會“以報入像”的營銷策略，以《大同報》為平台樹立良好的公眾形象來抬升社會地位。出於互利共贏的利益驅動，中國官員群體與廣學會在推廣《大同報》的目標上達成共識。一言以蔽之，西學的知識空間與群體間的利益牽連帶動了文化市場的生意經。

媒介與社會互為構建，考察媒介的傳播效力須將其置於所處的社會結構及權力運作之中。加

拿大學者哈羅德·英尼斯(Harold Innis)認為政治結構的相對穩定取決於社會中傳播媒介的平衡和比例,實際上,媒介的持續運營也依賴於政治權力機制的穩定。辛亥革命的爆發,導致廣學會與晚清官員已經建立的互動關係中斷,《大同報》的發行陷入困境。民國新立,廣學會採取多渠道提升《大同報》的社會關注度,冀圖與新政權官員建立互動關係網。整體來看,《大同報》與中國官員群體間的互動是一場知識與權力的互惠合作。不過,士人往往博覽群書來擴展西學閱讀空間,不會只將目光集中於一份報刊之上。中國本土出版機構興盛,承擔起構建中國知識倉庫的重任。在此情形之下,廣學會與中國官員之間的互動利益失衡,《大同報》難逃停刊命運。這也為當今出版行業提供了一定的啟迪。出版機構在社會變革之中,只有牢固把握定位群體的利益需求,挖掘自身的出版特色,才能在文化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

①李提摩太:《給英駐上海領事白利蘭的信》,轉引自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頁。

②蔣建國:《〈時務報〉的發行與“閱讀共同體”的建構》,濟南:《東嶽論叢》,2019年第1期。

③邁克爾·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陳昌鳳、常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4頁。

④趙曉蘭、吳潮關注到《大同報》的創刊、編輯群體及內容特色,對該報介紹最為詳實(《傳教士中文報刊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陳喆關注到《大同報》的衰落情況(《20世紀初廣學會文字出版事業方針的轉變》,成都:《宗教學研究》,2011年第2期);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對《大同報》的介紹為“每周發行。分論說、譯著、新聞三部”(《中國報學史》,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2014年,第76頁)。其實,《大同報》並非一直實行周刊,它在1915年改為月刊,版塊設置也進行過多次調整。

⑤⑦《本報十周紀念祝詞之袁大總統祝詞》,上海:《大同報》,1914年第20卷第9期。

⑥呂碧城:《論上海宜設女學報及女學調查會》,天津:《教育雜誌》,1905年第12期。

⑦《記大同報》,上海:《萬國公報》,1904年第182期。

⑧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The Nine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th, 1905-1906,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06, Box 79.190C, 3 of 3,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Contents Annual Reports* (以下簡寫為 PCC Foreign Missions

Contents Annual Reports) 1887-1926,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Archives(以下簡稱為 UCC Archives)。

⑩季理斐:《廣學會年會報告記》,上海:《萬國公報》,1906年第206期。

⑪莫安仁、徐惟岱:《大同報改良發刊詞》,上海:《大同報》,1907年第7卷第1期。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Donald MacGillivray,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Being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1910*,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0, p. 345.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山西巡撫恩藝棠中丞照片:附恩藝帥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年第7卷第8期。恩壽,字藝棠。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學部尚書榮華卿中堂照片:附榮中堂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年第7卷第18期。榮慶,號華卿。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Special servic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November 29, 1907, p. 7.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2, p. 317.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The Twenty-Ni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th, 1915-1916,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8, Box 79.190C, 3 of 3, *PCC Foreign Missions Contents Annual Reports 1887-1926*.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Donald MacGillivray, “Some Secular Allies in China”, *The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1915, p. 596.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陳喆:《20世紀初廣學會文字出版事業方針的轉

- 變》，成都：《宗教學研究》，2011年第2期。
- ⑲⑳The Thirty-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th, 1917-1918,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8, Box 79.190C, 3 of 3, *PCC Foreign Missions Contents Annual Reports 1887-1926*.
- ㉑“We have received No. 12 of the *Ta Tung Pao*”,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70-1941)*, May 20, 1904, p. 45.
- ㉒⑳㉓㉔The Eigh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th, 1904-1905,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05, Box 79.190C, 3 of 3, *PCC Foreign Missions Contents Annual Reports 1887-1926*.
- ㉕㉖㉗《山東藩台吳贊臣方伯照片：附吳方伯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年第7卷第7期。吳廷斌，字贊臣。
- ㉘㉙The Letter from Donald MacGillivray to *Ta Tung Pao* Dear Friend, June 8th, 1913, Box 1, file 9,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Shanghai Mission, January-June, 1913, UCC Archives.
- ㉚㉛《浙江撫台張筱帆中丞照片：附張筱帥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年第7卷第16期。張曾歆，字筱帆。
- ㉜《湖北全省提督軍門夏琅溪軍門照片：附夏軍門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年第8卷第7期。夏毓秀，字琅溪。
- ㉝查爾斯·霍頓·庫利：《社會過程》，洪小良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第164頁。
- ㉞㉟《兩廣總督周玉山制軍照片：附周玉山制軍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年第7卷第10期。周馥，字玉山。
- ㊱《山西學台錫學使緞照片：附錫學使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年第7卷第11期。
- ㊲《山西臬台丁衡甫廉訪照片：附丁廉訪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年第7卷第20期。丁寶銓，字衡甫。
- ㊳《江蘇巡撫部院陳小石中丞照片：附陳中丞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年第7卷第15期。陳夔龍，字小石。
- ㊴《商約大臣呂鏡宇都統來函》，上海：《大同報》，1907年第7卷第3期。呂海寰，字鏡宇。
- ㊵《山東撫台楊蓮府中丞照片：附楊中丞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年第7卷第9期。楊士驥，號蓮府。
- ㊶《江西撫台瑞鼎臣中丞照片：附瑞中丞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年第7卷第21期。瑞良，字鼎臣。
- ㊷《陝西撫台曹仲銘中丞照片：附曹中丞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年第8卷第3期。曹鴻勳，字仲銘。
- ㊸《吉林將軍達馨三軍帥照片：附達軍帥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年第7卷第17期。達桂，字馨三。
- ㊹㊺The Twentie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th, 1906-1907,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07, Box 79.190C, 3 of 3, *PCC Foreign Missions Contents Annual Reports 1887-1926*.
- ㊻《前福建藩台，正任安徽藩台連仲甫方伯照片：附連方伯來書》，上海：《大同報》，1908年第9卷第4期。連甲，字仲甫。
- ㊼《廣東水陸提督軍門李直繩軍門照片：附李軍門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年第7卷第23期。李準，字直繩。
- ㊽《江蘇新任上海縣李紫璈明府照片：附李大令來書》，上海：《大同報》，1907年第8卷第4期。李超瓊，字紫璈。
- ㊾William Arthur Cornaby, “To the Editor of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July 16, 1908, p. 8.
- ㊿《丹陽商會總董董蔭軒先生：附董先生來書》，上海：《大同報》，1908年第9卷第9期。董影禪，字蔭軒。
- ①戴師鐸、覺民甫：《讀大同報感言》，上海：《大同報》，1908年第10卷第15期。
- ②W. A. Gamson & G. Wolfsfeld, “Movements and Media as Interacting System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1, July 1993, p. 119.

- ⑤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南京：鳳凰出版社，2019年，第34頁。
- ⑥Memoirs, letters, articles, written or edited by, or of interest to Rev. Donald MacGillivray, M. A., D. D. [1888-1931], p. 296, Uncertain editing time, Box BV3427.M3 Large, UCC Archives.
- ⑦“Good News From Japan”,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XXXVII, December 1906, p. 708.
- ⑧⑨⑩⑪ The Twenty-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st, 1910-1911,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1, Box 79.190C, 3 of 3, *PCC Foreign Missions Contents Annual Reports 1887-1926*.
- ⑫⑬ The Twenty-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th, 1908-1909, Shanghai: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09, Box 79.190C, 3 of 3, *PCC Foreign Missions Contents Annual Reports 1887-1926*.
- ⑭Donald MacGillivray,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Being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1911*,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0, p. 393.
- ⑮The 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th, 1903-1904, Shanghai: the “Shanghai Mercury” Office, 1904, Box 79.190C, 3 of 3, *PCC Foreign Missions Contents Annual Reports 1887-1926*.
- ⑯The Letter from Donald MacGillivray to Dr. MacKay, November 10, 1913, Box 1, file 10,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Shanghai Mission, July-December, 1913, UCC Archives.
- ⑰The Letter from Donald MacGillivray to Dr. MacKay, June 9th, 1914, Box 1, file 10,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Shanghai Mission, January-June, 1914, UCC Archives.
- ⑱⑲ The Letter from Donald MacGillivray to Dr. MacKay, November 6th, 1914, Box 1, file 12,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Shanghai Mission, July-December, 1914, UCC Archives.
- ⑳Letter No. 14, R. P. Mackay to Donald MacGillivray, October 21, 1914, Box 1, file 11,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No. January-June, 1914, UCC Archives.
- ㉑《早地種麥，錄〈大同報〉》，北京：《農林公報》，1913年第2卷第20期。
- ㉒《早地種麥法，轉載〈大同報〉》，杭州：《農業淺說》，1918年第4期。
- ㉓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15卷第43～44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6頁。
- ㉔《本報十周紀念祝詞之黎副總統頌詞》，上海：《大同報》，1914年第20卷第9期。
- ㉕《本報十周紀念祝詞之陸軍段總長頌詞》，上海：《大同報》，1914年第20卷第9期。
- ㉖《本報十周紀念祝詞之熊內閣祝詞》，上海：《大同報》，1914年第20卷第9期。
- ㉗《本報十周紀念祝詞之外交孫總長祝詞》，上海：《大同報》，1914年第20卷第9期。
- ㉘詹姆斯·W. 凱瑞：《作為文化的傳播：“媒介與社會”論文集》，丁未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年，第4頁。
- ㉙Margaret H Brown, *MacGillivray of Shanghai: The Life of Donald MacGillivray*, Toronto: Ryerson Press, 1968, p. 96.
- ㉚季理斐：《論袁黎正副二總統之新喻言》，上海：《大同報》，1914年第20卷第30期。
- ㉛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23—文化》，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72頁。
- ㉜黃典林：《重讀〈電視話語的編碼與解碼〉——兼評斯圖亞特·霍爾對傳媒文化研究的方法論貢獻》，北京：《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年第5期。

作者簡介：宋豔華，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青島大學歷史學院講師。南京 210046

[責任編輯 陳志雄]